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效应

李珮璘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效应

李珮璘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李珮璘著. —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443-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企业-对外投资-直接
投资-研究-中国 IV. ①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656 号

中国企业的全球战略

——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效应

著 者: 李珮璘

责任编辑: 应韶荃

封面设计: 陆红强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443-3/F·426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 5—10 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

一、以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参加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为动力构建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 BIT 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度应与经济发

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能够有效地形成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中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中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 平台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30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

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把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

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中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

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的 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 30 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应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制宜。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

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實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视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加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张幼文 徐明棋

2013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001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008

第三节 本书内容与结构安排 013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016

第五节 预期创新点 017

第二章 文献综述 020

第一节 主流 FDI 理论 021

第二节 新兴经济体 ODI 理论及其特点 031

第三节 中国 ODI 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039

第四节 主流 FDI 理论解释新兴经济体 ODI 的不足之处 043

第三章 新兴经济体 ODI 的发展阶段 048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 ODI 发展阶段的主要观点 048

第二节 中国 ODI 的发展阶段 051

第三节 对新兴经济体 ODI 发展阶段的进一步分析 065

第四章 新兴经济体 ODI 的动因 071

第一节 ODI 动因的类型 071

第二节 新兴经济体 ODI 动因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074

第三节 中国 ODI 的动因分析 080

第四节	中国 ODI 动因的特征·····	093
第五节	新兴经济体 ODI 动因的进一步分析·····	098
第五章	新兴经济体 ODI 的决定因素 ·····	101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 ODI 的主要决定因素·····	101
第二节	中国 ODI 的母国决定因素·····	106
第三节	新兴经济体 ODI 决定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124
第六章	新兴经济体 ODI 的母国效应 ·····	126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 ODI 的一般效应·····	126
第二节	中国 ODI 的资源获取效应·····	132
第三节	中国 ODI 的贸易效应·····	146
第四节	中国 O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161
第五节	新兴经济体 ODI 母国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177
第七章	结论 ·····	178
参考文献	·····	208

第一章 导 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迅猛发展,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本章首先介绍本研究的实践与理论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拟研究的问题。在对本书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后,对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作简要介绍,说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最后对所预期的创新点进行展望。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一、实 践 背 景

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驱动、自身市场化改革导向下的政策调整等有利的内外部条件,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金砖四国”(BRICs)、“展望五国”(Vista-5)、“新钻 11 国”(Next-11)”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其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2008 年以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但目前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一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IMF 最新估计,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3 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全球的 50.4%(汇率法为 39.4%),历史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预计 2018 年将提高到 53.9%。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外

直接投资(ODI,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也获得巨大发展。从流量水平来看,以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中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印尼、沙特阿拉伯、韩国、阿根廷和土耳其等 11 国为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 2015》提供的数据,2014 年这 11 国 ODI 总额为 2 404.0 亿美元,占全球 ODI 总额的 17.8%,相当于发达经济体 ODI 总额的 29.2%,占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含以上 11 大新兴经济体)ODI 总额的 40.5%,而 1991 年这 11 大新兴经济体 ODI 总额仅为 37.5 亿美元左右,占比依次为 1.7%、1.7%和 40.0%。从统计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新兴经济体不仅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也是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 ODI 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涌现的众多新兴经济体中,“金砖四国”无疑最具有代表性。目前“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42%,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 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 12.8%^①,其经济表现出的强劲活力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近 30 年的时间内经济年均增长超过 9%。印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巴西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都根据各自国情进行了经济改革,俄、印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都在 6%左右,巴西在 3%至 5%之间,均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金砖四国”ODI 的发展。UNCTAD 各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末,“金砖四国”ODI 总额占全球 ODI 总额的年平均比重仅为 1%左右,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比例则上升至 4%左右,2014 年“金砖四国”ODI 总额达 1 787.5 亿美元,占全球 ODI 总额的比重更是上升至 13.2%。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金砖四国”中,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是中国,中国 ODI 的发展也引人瞩目。《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 年,尽管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 1 231.1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4.2%,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8 826 亿美元,全球排名由第 11 升至第 8 位,相当于美国的 14.0%、英国的 55.7%、德国的 55.7%、法国的 69%、日本的 74.0%,与上年相比,占美国的比例稳步提升,占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四个国家的比例大幅度提升,显示了自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仅没有

^①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7/content_11553224.htm.

下降,反而进一步提升。截至 2014 年底,中国 1.85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 2.97 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 186 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 3.1 万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贡献突出。2014 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15 692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5%;2014 年中国境外企业(含金融类)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 191.5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2013 年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达 185.5 万人,其中直接雇用外方员工 83.3 万人,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途径。

在新兴经济体 ODI 规模扩张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在 ODI 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更加引人注目。与传统 ODI,即拥有一定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跨国界的资产运用所进行的 ODI 不同,不少缺少所有权优势(即所有权劣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仍然通过 ODI 进行国际化扩张,有些甚至在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跨国并购,Moon & Roehl(2001)称之为非传统 ODI(unconventional ODI),并总结了这两类 ODI 的特征,如表 1.1 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 ODI 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似乎颠覆了一国 ODI 发展的正常轨迹。

表 1.1 传统 ODI 与非传统 ODI 的特征

类 别	传统 ODI(所有权优势)	非传统 ODI(所有权劣势)
市场寻求型(factor-seeking)	传统优势(技术、资本等)	小规模国内市场
要素寻求型(factor-seeking)	传统优势(技术、资本等)	缺乏关键技术或资源
寡占反应(oligopolistic reaction)	领导者 传统优势(技术、资本等)	追随者 竞争威胁
分散风险(risk diversification)	财务原因 资本剩余	政治原因 政治不稳定
来源国效应(country of origin)	良好的国家形象	较差的国家形象

• 资料来源: Moon & Roehl(2001)。

新兴经济体 ODI 的发展催生了全球竞争的新力量:新兴跨国公司(Emerging MNCs)。所谓新兴跨国公司指来自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在一个或多个国家从事价值增值活动并对跨国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国际化企业(Luo & Tung, 2007)。新兴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参与者。2013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金砖四国”总共有 118 家跨国公司上榜,其中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地区)有 95 家企业入选,上榜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的 132 家,比日本多

33家,名列全球第二,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除美国以外上榜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中,仅中国上榜企业数就高达103家,美国上榜企业128家,中美两国上榜公司的数量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我国ODI的发展孕育了中国跨国公司,而这些跨国公司又成为中国ODI发展的主力军。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中国非金融类跨国公司100强多为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近年来,这些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资源开采、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总体来看,尽管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来源国、所选择的产业、竞争优势、目标市场和国际化路径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但整体上那些比较成功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仍具有一些典型特征:

(1) ODI区位范围广泛,并不断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范围比较广泛,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同时其跨国化经营活动也不断向先进产业和更高价值增值活动领域拓展,如中国的联想、海尔、腾讯,印度的Tata、Mittal Steel等就是其典型代表。

(2) 积极进行跨国并购。波士顿咨询公司2006年列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自工业产品、耐用消费品和电讯、制药、信息技术等领域前100位公司,这些公司不仅通过出口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而且通过并购方式在内的ODI积极推进跨国化发展,在1985—2005年间,这100家企业中有57%的企业的并购活动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①。《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595起,实际交易总额569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324.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6.4%,并购涉及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16个行业大类。

(3) 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明显的资产寻求动因。不少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进入发达国家时更多是由发展所有权优势的资产寻求动因(asset-seeking motives)所驱动(Liu、Buck & Shu, 2005),这一实践表明所有权优势并非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形成的先决条件,而有可能是其形成后进行ODI所要实现的战略

① BCG Report, The New Global Challengers: How 100 Top Companies from Rapidly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Changing the World,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Research, 2006.

目标。

(4) 政府在企业对外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如 Wang(2002)认为,中国企业 ODI 是中国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政府对国家 ODI 结构的形成发挥关键作用。

从现实背景来看,无论是新兴经济体 ODI 总体的发展,还是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涌现,都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发达国家与传统第三世界国家 ODI 发展和跨国公司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对新兴经济体 ODI 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结合一些典型国家的实证研究,从中发现新兴经济体 ODI 的一般规律和独特性,以便更好地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背景

理论来自实践,新兴经济体 ODI 的发展推动了新兴经济体 ODI 研究的进展,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兴跨国公司的涌现,对新兴经济体 ODI 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经济、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前沿问题,而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 ODI 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目前新兴经济体 ODI 研究主要有两大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是利用主流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理论及其拓展解释新兴经济体 ODI,试图将新兴经济体 ODI 实践纳入到传统分析框架中,其目的是说明新兴经济体在 ODI 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到需要新理论来解释,从而证实主流 FDI 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持这种思路的学者主要是 Dunning(2006)和 Narula(2006)等。当然,这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新兴经济体 ODI 的独特性,因此对主流 FDI 理论进行了拓展。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联盟资本主义(alliance capitalism)的出现和技术的进步,Dunning(1995)将所有权优势的范围扩展至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在内部产生的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扩大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 理论)的解释范围,而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 ODI 的重要影响促使 Dunning 等人在最近的研究中尝试将制度视角融入折衷范式中(Dunning & Lundan, 2008)。但总体上看,无论是坚持主流 FDI 理论的解释力,还是针对 ODI 发展的新趋势对主流 FDI 理论进行拓展,持第一种研究思路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